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以來，部分「先發」國家疫情已趨緩和，但不少「後發」國家感染人數未見明顯減退，甚至有方興未艾之勢；疫情對世界各地政治、經濟和社會帶來的衝擊，尚未完全浮現。疫後的全球治理格局勢將揭開新的一頁。

——編者

理解台灣本土民族主義

作為影響台海局勢的關鍵變數，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始終是兩岸學者關注的重要論題。日據時期以來，台灣不斷崛起的本土民族主義思潮成為觀察台灣政治民主化進程和政局的一把「鑰匙」。為此，吳啟納在〈民主化抑或民族主義化？——從歷史視角觀察台灣的政治轉型〉（《二十一世紀》2020年4月號）一文中，對台灣島內民族主義思潮的演變及其與民主化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深入闡釋，對於政、學兩界深刻認識台灣民主化的前世今生頗有助益。

正如作者所指出，「台灣民主的萌芽，源於二十世紀初殖民和右翼兩種基因的植入」。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據時期，使台灣本土與中國內地政治文化徹底疏離，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殖民與右翼色彩的民主觀念，並在島內地方精英群體大行其道。在1950至1970年代，敗退台灣的國民黨為了鞏固自身統治，不得不與這些地方精英在民主化的政治框架下尋求合作，使後者最終掌握了地方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層級的政治資源，並日漸形成右翼民主兼民族主義和以台灣獨立為目標的政治訴求。這種政治版圖的變化深刻影響了此後台灣民主化的形式與走向，主要表現為：制度、程序和民主原則遭遇挑戰；民粹化與多數暴力現象；民主無法為經濟提供助力。這種「常態」民主支配下的「變態」現象，幾乎成為當下台灣民主政治框架下無解的「困局」。

不僅如此，因為本土民族主義者並未徹底否認與中華文化之間的關係，使大陸政、學兩界對其試圖產生影響的台灣民主有所誤讀，進而積極利用「親情牌」和「讓利牌」的手段來強化對台灣政治的影響力。問題的關鍵卻在於，由於本土民族主義者具有左右台灣政局的權勢，儘管他們以民主化為口號，但實則是以此來實現其「民族國家化」之目的。在這種情勢下，「親情牌」和「讓利牌」自然難以發揮效力。作者此語隱含着兩者「途」既殊而「歸」更不同的意味。

總體說來，作者針對台灣本土民族主義的論述主要立足台灣自身而論。但自日據時期起，台灣就身處國際局勢變幻的漩渦之中。即便是在當下，

北京、華盛頓和東京等有關各方，都是影響該民族主義內容與形式的多重變數。若脫離這個大格局來談台灣本土民族主義，可能難以全面反映其真實面貌。

何志明 成都

2020.4.20

內隱的「領導核心」制

尹欽的〈當代中國政治中「領導核心」制之研究〉（《二十一世紀》2020年4月號），緣起於當前中國政治中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領導核心」概念重新被宣揚。與某些黨宣或「存在即合理」式的論證不同，本文試圖解釋這一概念隱含的權力制度邏輯。作者通過對政治史的梳理，以翔實的資料令人信服地指出，「領導核心」制是中共為解決「雙重負責制」困境的權力制度安排，但其問題在於：要麼「領導核心」只能「在制度外」施展權威一權力，從而使形式上的、法理上的國家權力制度變成虛文，削弱國家根本制度的正當性；要麼「領導核心」與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發生權力衝突，從而出現政治分裂和憲政危機的危險局面。

作者還敏銳地指出了2010年代「領導核心」制復活的背景：隨着中國「黨政合一」的思路愈來愈清晰，中共通過《憲法修正案》使一黨執政地位更加法理化，基本復活了毛澤東時代所宣揚的「黨是領導一切的」理念及其實踐。毫無疑問，這將對中國社會造成很大的影響；「領導核心」制在解決了「雙重負責制」困擾的同時，又衍生了一些新的棘手問題。

本文在理論上的貢獻是，對目前中國研究學界頗為流行的威權「韌性論」或「調適論」提出了挑戰。中國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之舉，意味着這些理論認為已經「制度化」的某些因素，也許並不一定那麼具有穩定性。所以，對於這些理論而言，要麼亟需對「制度化」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進行清晰界定，要麼需要承認，試圖調和「威權」及其「生命力」兩面性的理論建構努力可能並不怎麼成功——它沒有看到其所謂「制度化」現象背後的支配力量，即內隱的「領導核心」制。

本文稍嫌不足的地方是第四節的某些論述有些晦澀難解：黨國融合就是要「打造出一個『現代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使中國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建設成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作者需要進一步闡釋「現代」、「現代化」、「正常」這些詞語的具體含義，因為它們關涉到如何理解國家現代性、當前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及「領導核心」制之間的關係。

我們是否需要深思：為甚麼在中國，最高權力只能以名義權威和實質權威分離（這種分離終將走向「領導核心」制）

與「領導核心」制這兩種方式存在，以致無法生出另外的形式？對另一可能性的想像都成為了一種奢侈。

劉培偉 泰安

2020.4.16

記憶史與中共黨史研究

二十世紀70年代，西方學界興起新文化史研究範式，記憶史是其重要內容之一；及至二十世紀末，記憶史研究逐漸在中國學界展開。直到近些年，記憶史研究才開始進入中共黨史領域。記憶史與中共黨史的結合，為中國革命史的研究開闢了一條新路徑。任偉的〈中共革命史的追憶與詮釋——以平江起義為例〉（《二十一世紀》2020年4月號）是該研究領域的一個嘗試，作者以平江起義為案例，來探討政治權力與革命記憶在實踐當中的互動關係，從而揭示中共政治文化的運作機制。

作者認為，革命記憶的基本取向是「向中心靠攏」，而革命記憶的模式與策略都圍繞此一核心展開。他提到平江起義之所以被中共革命史重視，在於起義者上了井岡山，其上井岡山的動機也逐漸從當時的「迫不得已」變為主動「嚮往」井岡山的「紅旗」。對彭德懷個人在平江起義前後的評價，經歷了兩次變化，在革命者—野心家—革命者之間切換。關於平江起義的記憶，類似的書寫在中國革命史中比比皆是，它們皆契合了典型的革命敘事模式，服務於政治需要，而該模式藉着革命記憶的調整進一步得到鞏固。這樣，圍繞着中

心意識形態，政治權力與革命記憶彼此形塑。

作者進而分析塑造這些革命記憶所採取的幾種策略：前置時間和模糊具體場景，以後來的中心意識形態來解釋歷史動機；選擇性「凸顯與遺忘」革命中的黑暗，如隱藏平江地區的「紅色恐怖」來證明革命的正当性，又凸顯「紅色恐怖」來證明彭德懷手上沾滿人民的鮮血；憑空創造革命實踐中未有的內容，如將平江起義原本軍民疏離的情景變為軍民魚水之情，以呼應中共意識形態的「人民性」。

其實，諸多革命記憶與闡釋自相矛盾、錯漏百出，何以無人揭破？作者認為這是記憶者與統治者的一場共謀。記憶者出於政治壓力與求生本能，化被動為主動，向「中心」靠近。他們將意識形態內化為自己的思維，對自身的記憶與思想進行徹底改造，進而與統治者一起改造歷史的敘述。至此可見，作者的最終目標並非梳理革命記憶或做記憶史研究，而在於藉着革命記憶來刻畫中共政治文化如何運作並發揮作用。

在這篇文章中，大致可以看到記憶史與中共黨史結合，對中共黨史研究的推動及其限度。隨着記憶史視角的引入，與革命記憶相關的史料可以再度被挖掘與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有助於重寫中共黨史。然而，經歷過記憶史的耙梳之後，得出的結論往往只是為既有看法提供了一個佐證而已。

鄧軍 上海

2020.4.15